



江蘇明代作家及其地域文化特徵—— 《明代作家分省概述》之一章*

李時人、劉廷乾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

南京審計學院副教授

摘 要

今江蘇省地方大體相當於明代「南直隸」所屬之六府一州(應天、淮安、揚州、鎮江、蘇州、常州六府及直隸徐州)。江蘇明代作家不僅在全國範圍內占很大的比重——作家數量眾多，多有領袖文壇的大家，而且呈現出鮮明

* 1997 年筆者接受中華書局(北京)約稿，編撰《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明代卷》，旋即開始有關準備工作。為完成這項任務，先後組織編纂了《明人著述總目(稿)》、《明人詩文別集敘錄(稿)》、《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稿)》，並安排博士、碩士研究生以「明代作家研究」為題撰寫學位論文，十年來共完成了《明代山東作家研究》、《明代浙江作家研究》、《江蘇明代作家研究》等「分省作家研究」及《明代松江府作家研究》、《明代吉安府作家研究》等「分府作家研究」論文近三十篇，從而形成了有關明代作家的系列研究。現多種著述皆在整理之中，雖多以「實證」為主，也略有議論，此拈出《明代作家分省概述》中之一章，敬請學界同仁指正。



的地域文化特徵：一是形成了吳中、金陵、廣陵三個不同的區域作家隊伍，呈現出三種不同的文化生態；二是從科舉中走出來的作家成為作家隊伍的中堅，尤其蘇、常二府成為典型的科舉雄邑，大大提升了江蘇作家的數量和品質；三是文化家族的大量湧現，為地域文學的持續性發展提供了基礎；四是作家追求一種調和世俗與風雅的人生道路，使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市隱心態、鄉願生活觀突顯，特別是對「吳趣」的追求，成為吳中作家有別于其他地方作家的獨特個性。



**The Writers and the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Ming Dynasty — — One Chapter from
A Provincial Overview of the Writers in
Ming Dynasty**

Li Shiren

(Professor,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Liu Tingqian

(Associate Professor,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Abstract

Today's Jiangsu Province roughly equals to the six Fu and one Zhou (Zhou and Fu ar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Ming Dynasty, namely Yingtian, Huaian, Yangzhou, Zhenjiang, Suzhou, Changzhou, and Zhili Xuzhou. Writers of Jiangsu in Ming Dynasty account for a large proportion in China and most of them are great leaders in literature. Their writings show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culture: First, three different groups of regional writers, Wu, Jinling and Guangling, are gradually formed, presenting three different cultural ecologies; the second is that writers from imperial examinations become the backbone, especially those from Suzhou and Changzhou, which have greatly enhanced both the number of the quality of the team of the writers in Jiangsu povince. Third, cultural families spring up in large numbers, which provides a basi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literature; Fourth is that writers are seeking to reconcile the secular and the elegant, bringing art to life and making art a part of life. An attitude of “Shiyin” and a life value of “Xiangyuan” get prominent. The pursuit of “Wu Interest” becomes a unique personality of the local writers in Wu and makes them different from all others.



一、緒言

明初定鼎金陵，永樂北遷，改金陵為南京，所轄地區稱「南直隸」，大致相當於今之江蘇、安徽兩省及上海市的範圍。與今之江蘇省範圍大致相當的是隸于南直的應天府、淮安府、揚州府、鎮江府、蘇州府、常州府和徐州等六府一州。當時之六府一州經濟、文化有很大的差別，從作家人數來看也是很不平衡的。據我們的初步統計，有明一代江蘇共產生「作家」1950人。其中蘇州府七縣一州724人，常州府五縣348人，應天府八縣324人，揚州府七縣三州302人，鎮江府三縣198人，淮安府九縣二州36人，直隸徐州四縣18人¹。主要集中于蘇州、常州、應天、揚州、鎮江五府，淮安府和直隸徐州，不僅名作家少，而且整個作家的人數也無法與其他諸府相比。

從歷時性發展看，如果將明代江蘇作家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初期洪、永時期（洪武、建文、永樂，計56年），中期宣、弘時期（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計96年），後期嘉、萬時期（嘉靖、隆慶、萬曆，計97年），末期啟、禎時期（泰昌、天啟、崇禎、明末流亡政府，計41年），則蘇、常二府作家不僅在每一個時期都是主力，而且往往是創作成就最高者和文學思潮的引領者。

洪、永時期的作家主要集中于應天、蘇州二府，應天府有南京作為國都的優越條件，蘇州府則幾乎集中了所有元末遺存下來的文學精英，尤其

¹ 本文所謂「作家」，以有一定「文學」作品傳世為最基本條件，關於「明代作家」則作了一個大概的界定：從明王朝開國的洪武元年(1368)至桂王朱由榔永歷朝覆滅(1661)是主要時間斷限，其中由元入明者，在明入仕或主要創作活動在明朝者歸明；由明入清者，主要創作活動在明而又不為清人所用者歸明。此作家數字為我們根據大量材料所做的初步統計，後當以正式出版之著述為準。



是以高啟為首的「吳中四傑」的詩歌創作，一開始就站在了時代詩歌的高峰。宣、弘時期作家總數少於嘉、萬時期，但總體創作成績卻不低於嘉、萬時期，作家主要集中于蘇州、常州、應天三府，創作成就較高的作家則主要來自于蘇、常二州：蘇州有「前七子」之一的徐禎卿，常州有「茶陵派」的代表性人物邵寶。嘉、萬時期為作家數量急劇增加之時期，由於「後七子」的領袖人物王世貞主盟文壇數十年，影響至為深遠，所以，吳中作家不受其影響者鮮，但入於其彀者亦鮮。此期的作家隊伍仍以蘇、常二府唱主角，主要是因為「後七子」、「唐宋派」與二府有關。啟、禎時期作家數量相對於宣、弘和嘉、萬時期要少，但從嘉、萬開始繁盛的戲曲、小說此時以蘇州為中心得到長足的發展。詩文方面則蘇州府的婁東「復社」，常州府的「東林書院」，都影響帶動了不少作家，故此期作家仍以蘇、常二府為主導。

總的說來，江蘇明代作家主要集中于傳統意義上的江南一帶，而數量最多、創作成就最高的又出現于以蘇州為代表的吳中一帶。蘇州、常州、應天、揚州、鎮江五府地方在漢代都曾屬吳郡，共同構築了吳文化圈。吳文化發展至明代，在深厚的歷史積澱中，又煥發出新的活力，在這樣一個文化背景下生存發展的江蘇明代作家，也顯現出其獨特的地域文化特徵。

二、江蘇明代作家的區域劃分與文化生態

今江蘇地方在明代大體可以分為四個文化區域：一、以蘇州府、常州府為主的蘇常文化區域；二、以應天府、鎮江府為一體的金陵文化區域；三、以揚州府為代表的廣陵文化區域；四、淮安府、徐州等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徐淮文化區域。除徐淮地區作家僅有零星存在未能形成特色外，其餘三個地區的作家都因地域的不同而形成了不盡相同的文化生態。



（一）蘇常——豐厚的文化土壤與全面繁盛的作家隊伍

明代，蘇州、常州二府在文學上取得了全面繁榮，幾乎在每一個領域，都處於全國的領先地位。從作家隊伍的發展來看，不管是明代初期、中期，還是後期、末期，各個時期的作家都成批湧現，前後相繼，在全國也始終保持着發展的強勢。

從作家隊伍的構成來看，明代蘇常作家，特別是以蘇州為中心的「吳中」作家，從台閣文人到布衣作家，從獨立發展的個性作家到設壇壇、創流派的領袖人物，從詩文詞曲作家到戲劇小說作家，不管哪一類，都不是個別出現的現象。而且，在每一個文學發展階段、每一個文學領域，都有在全國文壇上佔據一定地位的作家出現。此外，蘇常地區還有一個獨特現象，這就是女性作家群體的湧現，如果以明代的府為單位進行比較，則蘇州府的女作家，不僅數量上要多於任何一府，創作的成就也很高，像陸卿子、徐媛、沈宜修，完全可稱為明代女作家的代表人物。

吳人好古，蘇、常二府的作家，大都有深厚的古學底蘊，文化修養很高，很多作家詩文書畫俱精，戲曲音樂兼善，此基於吳地豐厚的文化土壤。

吳地文人好藏書，富藏書，喜收宋元舊版。如成、弘時期的太倉人陸容，以好學稱，家藏萬卷，撰有《式齋藏書目錄》。正、嘉時期的常熟人楊儀，以讀書著述為事，建萬卷樓，多宋元舊本。嘉、萬時期的常熟人孫樓，家有博雅堂，亦藏書萬餘卷。跨越明代中、後期的楊循吉，藏書多達十餘萬卷，很多都是親手抄寫。明末常熟錢謙益的絳雲樓藏書，亦聞名東南。

與此相聯繫的是吳地作家大多學識淵深。清人好譏諷明人學問空疏，如拿專以學問為業的清代「乾嘉學人」來比照，自有道理，但如從作家的角度來看，則不儘然，尤其對吳中作家而言，則更有失公允。吳中作家中好學博古之士甚眾，隨手拈出數人：



吳寬：「為諸生，蔚有聞望，遍讀左氏、班、馬、唐、宋大家之文，欲盡棄制舉業，從事古學。」²「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輒傳播中外。」³

沈周：「年十一，遊南都，作百韻詩，上巡撫侍郎崔恭。面試《鳳凰台賦》，援筆立就，恭大嗟異。及長，書無所不覽。」⁴「自群經而下，若諸史子集，若釋老，若稗官小說，莫不貫總淹浹，其所得悉以資於詩。」⁵

史鑑：「其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熟于史論，千載事歷歷如見。而剖斷必公，蓋有宋劉道原之精。至於時事人言，得於聞見，往往筆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博焉。」⁶「三原王恕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訪以時政，鑒指陳利病，恕深服其才，以為可以當一面。」⁷

朱存理：「蚤歲力學，左圖右書，殆於忘寒暑。」⁸「好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對客舉似，如引繩貫珠，纚纚弗能休……居常無他過從，惟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為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筐篋。群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窺，而悉資以為詩。」⁹

²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75 頁。

³ 王鏊《文定吳公神道碑》，《震澤集》卷二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⁴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九八，中華書局 1974 年排印本第 7630 頁。

⁵ 文徵明《沈先生行狀》，《甫田集》卷二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⁶ 吳寬《隱士史明古墓表》，《匏翁家藏集》卷七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⁷ 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一《(史鑑)西村集》八卷《提要》。

⁸ 楊循吉《野航詩稿序》，朱存理《野航詩稿》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⁹ 文徵明《朱性甫先生墓誌銘》，《甫田集》卷二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蘇州府作家中，要說古學之淵深，則莫過於歸有光：「弱冠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郡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為文，大驚，以為當世士無及此者。」¹⁰而繼承歸有光之學的嘉定王志堅亦可稱得上是學問淵博之士：

通籍後，卜居吳門古南園，杜門却掃，肆志讀書，先經後史，先史後子、集。其讀經，先箋疏而後辨論。讀史，先證據而後發明。讀子，則謂唐、宋而後無子，當取說家之有裨經史者補之。讀集，則定秦、漢以後古文為五編，考核唐、宋碑志，援史傳，摭雜說，以參核其事之同異、文之純駁。其於內典，亦深辨性相之宗。¹¹

不僅蘇州作家如此，常州府作家也如此，故李東陽為秦旭作墓表說：「東吳多文獻，無錫殊盛，非惟科目踵接，山林名行之士亦多其人。」極力贊許秦旭「究心問學，不事章句。」¹²《明史》則稱邵寶之篤學：「學以洛、閩為的，嘗曰：『吾願為真士大夫，不願為假道學。』……為詩文，典重和雅，以東陽為宗。至於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則其所自得也。博綜群籍，有得則書之簡，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名之曰《日格子》。」¹³

除了注重學識外，最難能可貴的是吳中作家往往具有獨立自主意識的文化人格。江南的地理人文環境，尤其是受晉、宋南渡文化的影響，決定了吳中作家的聰穎靈慧而感情豐富，他們務實而又不乏浪漫氣質，所以，

¹⁰ 唐時升《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三易集》卷一七，《四庫禁毀書叢刊》第一七八冊影印明崇禎刻清康熙補修《嘉定四先生集》本。

¹¹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八，中華書局 1974 年排印本第 7402 頁。

¹² 李東陽《封中憲大夫湖廣武昌府知府秦公墓表》，《懷麓堂集》卷七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¹³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二，中華書局 1974 年排印本第 7246 頁。



吳中文學主「情」，抒寫性情，往往是作家的自覺追求。這種強調個人性情，加上豐富的文化積養，決定了他們在創作上很少盲從，而是有自己獨立的判斷，即使是受時代各種文學主潮的影響，他們也能聯繫自身實際而有所通變，仍能保持自我的鮮明個性。

明初以高啟為首的「吳中四傑」自覺地打出復古的旗幟，但他們的復古是為了振元末纖穠之習。高啟的復古在講究「格」的同時，更注重「意」與「趣」，講究「化」，講究通變，這和前後「七子」偏而擬的復古主張有着本質的不同。而且，四傑還有一個共同趣尚是格調與性靈並重，其對性靈的重視直接影響到此後的吳中詩派。沈周、楊循吉、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人，都主張抒寫「真性情」，自由表現主體情感。吳寬生活于李東陽「茶陵派」崛起之時，在注重學習唐詩格調的風氣中，又鮮明地表現出自己的創作個性。于時文創作反對拘守格範，反對穿鑿牽綴之辭，於詩則學習中晚唐並進而推崇蘇軾詩風，講究「趣」，詩風淺淡、新活，有向宋詩靠近而返之於理的傾向，其實是對李東陽格調說的反動。徐禎卿本是「前七子」之一，是當然的復古派人士，然而他詩學理論的核心是有別于李、何的「情才論」，其詩歌創作的實踐是「所操仍是吳音」，並因此成為當時吳中詩人之冠。王世貞是後期復古派的領袖，主盟文壇數十年，其地位於明代作家中無人能敵，其博學也難乎為繼，然首先對其進行批判的卻是與其地域相鄰的、比其古學根基更為扎實的歸有光，甚至直斥其為「庸妄鉅子」。王世貞以叱吒文壇的氣勢，使當時的四海之士紛紛奔驅門下，然最與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人物，吳中幾乎沒有。在多少有些一廂情願色彩的王氏所開的「諸子」名單中，吳中作家並不多，而且多是「二心」者，甚至不乏「叛逆」者。「五子」二十四人中¹⁴，吳中作家只有俞允文、趙用賢二人。俞允文以文交於歸有光，以賦見賞于文徵明，詩倒是近於「後七子」

¹⁴ 王世貞「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中，趙用賢重出於「續五子」與「末五子」中，故王氏「五子」系列實有二十四人。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四及《弇州續稿》卷三。



派，卻又不滿於李攀龍。「四十子」中雖有不少吳中作家，然王氏將其歸入一類實在很勉強，並非以創作主張與創作風格為重要劃分標準，像張鳳翼兄弟、王叔承、王穉登等幾個成就較高的作家，都是具有很強獨立文化品格的人。

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王穉登是《明史》中所稱的嘉、萬間布衣、山人的代表。王叔承與申時行、王錫爵、王世貞交往密切，以其聲望和才氣，至少可歸於王世貞的「五子」系列，然王氏卻將他置於「四十子」中，根本原因還是王叔承「論詩不甚傾心王、李」，而是強調「事與景者，天地所自有之物，偶遇而收之；情與意者，吾所本有之物，偶觸而發之。彼吾役也，吾不彼役也。」¹⁵王穉登是當時山人中影響最大者，與申時行、王世貞的關係最好，但他在《與方子服論書》一文中對李、何的批判毫不留情面，也有暗斥王世貞之意。王世貞「二友」之一、通家之好王錫爵之子王衡，對王世貞也不肯「北面」事之。「嘉定四先生」皆傾心古學、神屬歸有光一派，詩歌創作上同于錢謙益宗宋之風，但他們學歸有光，也只是學其治學精神與為文品格，並非亦步亦趨；「四先生」雖也受當時公安、竟陵的影響，然他們風骨自高，所抒寫的是真正的「性靈」，絕無二派之偏狹。

常州府作家中，邵寶為詩文雖宗李東陽，但為學原本經術，多所自得，故在當時有「真詩惟邵二泉」之譽。杭淮雖與「前七子」領袖李夢陽交往密切，卻強調要為詩所樂，不為詩所困，前提是要發於性、動於中，所以他的詩歌是宜興雙溪之靈氣的浸潤，而不是假靈于古人。華善繼、華善述兄弟異趣，善繼主動接近王世貞，然詩歌終究帶有自我個性，習染不深；善述則取法中晚唐韓、孟詩派，被王世貞以「不可為典要」目之，故兄被王世貞列入「四十子」，而弟無緣。

大凡蘇、常二府作家，于明代各大文學流派，不可能不受其影響，也多有追隨，但對於聲勢最大、持續最久的復古文風而言，論者往往以「習

¹⁵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一四，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28 頁。



染未深」評之，四字背後，顯示的還是吳人的獨立個性。其實，吳人普遍好古，尤其是蘇、常二府作家，他們于詩文創作上普遍傾慕漢唐兩宋，「七子」復古之風的刮起，還是根源于吳人的啟發。他們的復古，與吳中作家的好古有其相通之處，但不相合，吳中作家是講究有獨立個性的學古。

（二）金陵——帝都文化背景下交流與融匯中形成的開放式作家隊伍

明之應天、鎮江二府舊地，自兩漢至唐之前屬於同一個行政區域，或為丹陽郡，或為蔣州，或為潤州，至唐初，始析為江寧郡與丹陽郡。在晉室南渡的文化大融合時期，金陵與京口聯繫緊密，所以兩者之間的文化不僅是大為相同，而且實為一體。

金陵本來就是六朝故都，入明後，又成為大一統帝國的京城，所以，明初更顯出帝都文化色彩。永樂後期遷都，南京作為陪都存在，政治功能大為減弱，但由於處在文化發達的江南，反而因政治功能的淡化，更增強了它的文化功能。一是南京仍留有六部等中央政府機構，但形同虛設：「吏部不與銓選，禮部不知貢舉，戶部無斂散之實，兵部無調遣之行，視古若為冗員。」¹⁶眾多的六部官員多為清差閒職，使他們有大量的時間從事於創作，並形成群體。二是明朝在南京仍然設有國子監，同時作為南直隸首府，又是三年一次的鄉試考場所在地，匯聚着大批的士子文人，他們來自于不同的文化地域，有着不同的創作風貌，都在這裏進行着交流與融匯。所以南京實際成為大明王朝在南方的一個最大文化中心。

另外，南京作為帝都遺存和江南文化的中心，還成為南方最大的遊樂中心，對文人產生強大的吸引力，「秦淮風月」因此成為文藝滋生的溫床。

¹⁶ 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二「兩都」，陸榮、顧起元《庚巳編·客座贅語》，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6頁。



朱彝尊記云：

明制，南、北都各立教坊司，北有東、西二院，南有十四樓。其後南都舊院特盛，成、弘間，院中色藝優者，結二、三十姓為手帕姊妹，第月節，以春檠巧具殼核相鬥，名為「盒子會」。沈啟南曾為作圖，系以長句，然青樓之題詠無聞也。隆、萬以來，冶遊漸盛，浙有沈水部某，託名冰華梅史，以北京東、西院妓郝筠等四十人，配作葉子牌。金沙曹編修大章，立蓮台新會，以南曲妓王賽玉等一十四人，比諸進士榜。一時詞客，各狎所知，假手作詩詞曲子，以長其聲價。於是北裏鮮有不作韻語者。¹⁷

金陵的這種特殊的文化環境，形成一種衣冠文人與秦樓楚館的金粉佳麗以文藝相接的形態。在這種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其文學也表出現了自身的特點：一是文人的結社集會活動頻繁，社、會規模之大，參與人數之多，參與範圍之廣，為明代之最。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中于「金陵社集諸詩人」條記云：

海宇承平，陪京佳麗，仕宦者誇為仙都，遊譚者指為樂土。弘、正之間，顧華玉、王欽佩，以文章立壇；陳大聲、徐子仁，以詞曲擅場。江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翕集，風流弘長。嘉靖中年，朱子價、何元朗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為地主；皇甫子循、黃淳父之流為旅人；相與授簡分題，征歌選勝。秦淮一曲，煙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萬歷初年，陳寧鄉芹，解組石城，卜居笛步，置驛邀賓，復修青溪之社。於是在衡、仲交，以舊老而蒞盟；幼于、百穀，以勝流而至止。厥後軒車紛遞，唱和頻煩。雖詞章未嫻大雅，而盤遊無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後

¹⁷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三，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61 頁。



二十餘年，閩人曹學佺能始回翔棘寺，遊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縉紳則臧晉叔、陳德遠為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父、盛太古為領袖。台城懷古，爰為憑弔之篇；新亭送客，亦有傷離之作。筆墨橫飛，篇帙騰湧。此金陵之極盛也。¹⁸

又在「齊王孫承綵」條中說：

萬歷甲辰中秋，開大社于金陵，胥會海內名士張幼于輩，分賦授簡百二十人，秦淮伎女馬湘蘭以下四十餘人，咸相為緝文墨、理弦歌，修容拂拭，以須宴集，若舉子之望走鎖院焉。承平盛事，白下人至今豔稱之¹⁹。

以錢氏所載，金陵就有五次大的社事文會活動，從中期弘治時開始，一直綿延至明末。僅朱承彩所開的大社就有一百二十多名文人參與，四十多名歌妓穿梭其間。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在「白門新社諸詩人」條中記載了他于萬歷末得閩人謝雒所輯《白門新社詩》八卷，凡一百四十人。由此可見，嘉、萬時期的幾次文人大聚會，每次可能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人，而且每次都有歌妓參與其中。這就帶來了第二個特點，即培訓出一批才妓作家，如馬湘蘭等，從而成為金陵作家群體中所獨有的一道風景。

從歷次集會來看，金陵本地作家佔據地利，可能在人數上是主體，但流寓和外地赴會的「海內名士」卻是主導。由於地理上的原因，這些外地名家自然又以江、浙為多。在這種社、集活動中，作家之間切磋與品評自然必不可少，於是金陵文化與外來文化就時時處在一種衝擊與融合的狀態之中。金陵本地作家與外來作家也時時處在一種交流和融匯的狀態，這就是帝都文化的特徵。

¹⁸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462頁。

¹⁹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471頁。



在這樣一種文化背景下，金陵流寓作家的數量就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而且顯示的是一種強勢，本地作家實際上處在一個弱勢地位。這表現在金陵本地有影響力、成就高的名作家少，詩文中除了「金陵三俊」的顧璘、陳沂、王韋，散曲中除了陳鐸、金鑾（二人其實也是外地人僑居金陵），可在明代文學史上寫上一筆外，其他可以稱得上是名家的實在不多。再就是文化人格中的自主意識並不明顯。金陵作家首屈一指的當屬顧璘，但他主要是「前七子」的忠實追隨者。在這一點上，應天府作家之有顧璘，恰如蘇州府作家之有徐禎卿，然徐禎卿之復古仍帶有「吳音」，而顧璘之復古卻失去了個性。既然金陵本地作家在文學活動中處於一種弱勢地位，那麼，他的鄉邦文學的地域特徵也就淡化在帝都文學裏了，因為帝都文學更多地帶有時代文學的共性特徵。

（三）廣陵——繁華消歇後疏星耀空的作家狀況

揚州在唐時最盛，北宋時還是「淮左名都」，但經過宋、元三百餘年的經濟變遷及戰火摧殘，到明代，往日的繁華氣象已不復存在，直到清初，揚州才因鹽業的發達而又迅速繁榮起來。所以明代的揚州是處於北宋之後、清初之前的繁華消歇時期。

明代，經濟文化最繁榮地區是江南的太湖流域，即南直的蘇、松、常及浙江的杭、嘉、湖六府，而蘇州又是這一帶最為繁華的大都市。揚州既不如蘇州經濟、文化之發達，又沒有蘇州所處的優越的周邊環境。本來，揚州為江北重鎮，憑藉長江和運河的便利水運條件，歷來為舉子赴試、官員遷謫來往的一條重要通道，發展文化仍有一定的地理優勢，但由於經濟、文化相對沉寂，特別是揚州與南京之間本來就有極其便利的長江水道，所以，很多官員和文人墨客，即使路過揚州，也少在揚州駐足，這一優勢並未得到發揮，反而更加顯示出與南京政治、經濟、文化地位的落差。

明代揚州府作家的集會結社活動，作家之間的創作交流活動，既沒有



蘇、常二府的密集與頻繁，也沒有南京的規模之宏大。雖然本地所產的作家，如朱應登和宗臣，一為「前七子」派的重要成員，一為「後七子」之一。然而作為揚州府作家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並沒有在當地形成追隨者群體。宗臣固然因為早逝而未及發展，朱應登有很好的條件，又有一個文化家族為基礎，但他只能跨江至石城，與「金陵三俊」並稱為「四大家」，家居時，也只是父子兄弟間唱和于東溪田廬。

總起來說，明代揚州府成就較高的作家不多，主要有高郵的汪廣洋、王磐、張縉，泰州的儲懌，寶應的朱應登、朱曰藩父子，如皋的冒愈昌、冒襄，江都的陸弼、儀真的蔣山卿，興化的宗臣等等，散處於揚州府的各州縣，數量上也遠不及蘇、常二府。繁華消歇，疏星曜空，確是明代揚州府作家的現狀。

三、科舉與江蘇明代作家隊伍的發展

有明一代，江南科舉遠盛於北方，特別是蘇州府可稱為科舉雄邑和狀元之邦，僅次於蘇州府的是常州府。根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及《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統計，扣除衛籍進士，則江蘇明代各府、州進士情況是：蘇州府 872 人，常州府 591 人，應天府 240 人，揚州府 226 人，鎮江府 155 人，淮安府 84 人，徐州 13 人。分佈是極不平衡的，以蘇州府、常州府為最多。放在全國去衡量，五百名進士以上的府有十個，江蘇就有兩個，蘇州府居第一位，常州府居第六位；以縣為單位衡量，則全國一百名進士以上的縣有三十個，蘇州府有吳縣、長洲、昆山、常熟四縣，常州府有武進、無錫、宜興三縣²⁰。

置於明代經濟文化最為繁榮的太湖流域的蘇、松、常、杭、嘉、湖六府來比較，包括衛籍在內的所有進士都統計在內，則六府進士情況是：蘇

²⁰ 方志遠《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中華書局 2004 年版第 52 頁。



州府 1025 人，常州府 636 人，杭州府 477 人，嘉興府 471 人，松江府 424 人，湖州府 287 人，仍以蘇、常二府為最多。以六府各縣為單位統計，超過一百名進士以上的縣，蘇州府七縣一州中有六縣（州），常州府五縣中有三縣，杭州府九縣、嘉興府八縣、松江府三縣中分別各有二縣。顯然占比最大的是蘇、松、常三府，而三府在明代都屬於南直隸²¹。如果忽略地域大小與人口數量的不平衡因素，則明代的蘇、常二府在科舉中明顯處於領先優勢。從狀元來看，明代共出狀元 89 人，上舉六府中，蘇州 7 人，常州 4 人，松江 3 人，杭州、嘉興、湖州各 2 人。明代一甲狀元、榜眼、探花數量，南直和浙江就占了將近一半。楊循吉云：

吾蘇自近年來，甲申科昆山諭德陸公（陸鈺）第一，壬辰科則為吳公（吳寬）第一，公長洲人也，乙未科吳縣翰林王先生（王鏊）復第一，至君（趙寬）為辛丑科復第一。蓋連十五年之間，會試榜元出於蘇州者有四人，科目之盛，無以加矣²²。

楊循吉所說的是從天順六年（1464）至成化十七年（1481），連續七科中有四科的會試第一名都是蘇州府人。同榜兩元的，如嘉靖四十一年（1562）科狀元是長洲申時行，榜眼是太倉王錫爵。而王錫爵與其子王衡皆榜眼，錫爵之弟鼎爵亦中在進士第五名，父子兄弟皆中高第。王世貞說：「萬曆己卯、壬午，南畿解元連為吾州人陸大成、吾子士騏，又一科為戊子，王衡復為解元。」²³這是太倉一州（府轄州）于南京應舉人考試時取得的佳績。

明代吳中科舉所以發達的原因，無疑得益於其地理、人文的優越條件。

²¹ 范金民《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佈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學學報》1997 年第 2 期第 171 頁。

²² 楊循吉《七人聯句詩記》，《四庫存目叢書》史部第一二七冊影印明顧氏家塾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

²³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秀美山川的靈性滋養，文獻淵藪的智力培植，科舉康莊的前後援引，家族父兄的代代承傳，從而形成良性發展機制。但其最重要的原因大概還是對文教事業的重視。

首先是官府對文教事業的重視與倡導。蘇州地區尚文好學之風由來已久。雖然由於歷史的原因，唐中葉以前，北方文化一直領先於江南，但至宋代，由於各方面的原因，情況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襁褓中就隨母親流落山東的范仲淹，正是由於在宋代四大書院之一的睢陽應天府書院苦讀，始通過科考改變自己的命運，因深知學校之重要，至其治蘇，始創府學，延大儒，設義莊，大興文教，立示範於鄉邦。這種傳統延續至明代，更加發揚光大之。蘇州為江南重邑，明代治蘇官員均選出類拔萃者膺任，而重視文教，以文教強邦，也是歷屆官員之共識。明代有「姑蘇五太守」之稱，季亨、魏觀、王觀、姚善、況鐘，皆以賢能著稱。《明史》記明初蘇州太守魏觀，謂其：

以明教化、正風俗為治。建黌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授貢穎之定學儀；王彝、高啟、張羽訂經史；耆民周壽誼、楊茂、林文友行鄉飲酒禮。政化大行，課績為天下最。²⁴

魏觀首先為明代蘇州的文教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而促其大盛的則是宣德、正統間的蘇州名守況鐘。況鐘從宣德五年（1430）開始，至正統七年（1442）卒于蘇州，一直在蘇州府任上，其在蘇州治績最重要一條就是興辦學校，培養舉薦人才。況鐘于正統初年大規模擴建府學，使府學有房屋數百間之多，為士子提供了良好的學習條件。晚明嘉定唐時升、婁堅、程嘉燧、李流芳四人以詩文稱，內除李流芳曾舉孝廉外，另三人皆為布衣，崇禎時縣令謝三賓將四人詩文合刻為《嘉定四先生集》，使四先生因此廣為人知，成為鄉黨楷模，也為地方官重視文教之顯例。

²⁴ 張廷玉等《明史》卷一四〇，中華書局1974年排印本第4002頁。



與此相應的是吳中民間對文教事業的重視。文化教育的悠久歷史積澱，官府的重視與倡導，使吳人好學之風不僅代代相傳，而且深入人心。重視文化教育的一個直接目的，是為了科舉功名，文化教育的發達自然促進了科舉。吳人科考中式者並非限於讀書世家，起於田間、起于商肆者也頗多，如「景泰十才子」中的徐震，出身于吳縣巨族，但世無出仕者，徐震將二子取名為縉、紳，聘師日夜督學，縉終於考中進士。長洲吳行，世代務農，家境艱難，但他「內負幹力，奮自樹植……教子專用儒業」²⁵。後其子一鵬舉進士，入翰林，累官至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弘正間吳中官品最高者稱「二吳一王」，指的就是吳寬、吳一鵬和王鏊。吳一鵬之子吳子孝也中了進士，父子皆是吳中有名詩人。由於對科舉功名的普遍重視，在吳中甚至形成了一種競爭的風氣，歸有光云：

吳為人材淵藪，文字之盛，甲於天下。其人恥為他業，自髻鬣以上，皆能誦習。舉子應主司之試，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己者。江以南，其俗盡然。每歲大比，棘圍之外林立。京兆裁以解額，雋者百三十五人耳。故雖方州大邑，恒不能三、四數。至或連歲無舉者，有司以為恥²⁶。

歸有光本人就是一個典型個案，其三十五歲中舉，八上春官而不第，直至六十歲才得中進士。在競爭壓力下，吳人為博得一第，往往鏗而不捨。

當然，吳人發達的文教事業有賴於雄厚的經濟實力的支持。明代江南是重賦區，洪武年間，蘇州土地僅占全國 1% 多一點，而稅糧卻占近 10%。地少人多，賦稅繁重，使人們多有危機感，想擺脫對土地的依賴另謀出路，走向科舉功名無疑是當時最理想的途徑。而物產的富饒與經濟實力的雄厚，又為人們從事舉業提供了財力支援。歸有光為了應試，二十多年內在昆山

²⁵ 王鏊《承事郎徐君墓誌銘》，《震澤集》卷二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²⁶ 歸有光《送王汝康會試序》，《震川集》卷一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至北京的路途上走了九個來回，如果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是很難堅持的。王世貞曾說：「余舉進士不能攻苦食儉，初歲費將三百金，同年中有費不能百金者。今遂過六七百金，無不取貸於人。」²⁷僅一次會試，就要花費如許，歸有光的九次自可估算得出。

吳中科舉發達當然與制藝水準高有關係。明代曾有所謂「時文四大家」之稱：八股體式定型于明憲宗，成化十一年(1475)會試，吳縣王鏊第一，其文清剛古樸，神完氣足，理法純備，因得獨佔鰲頭；弘治三年(1490)華亭錢福又會試第一，其文善於刻畫，亦成大家，遂以「王、錢」並稱。至嘉靖時，武進唐順之傳王鏊之法，又運以唐、宋古文雄肆之氣，渾灑流轉，冠絕當時；繼之常熟瞿景淳又以精確沖夷，別樹一幟，因成「王、錢、唐、瞿」四家之稱。唐順之之後，武進薛應旂貫通六經，出之爐冶而金質自現，堪為高標，於是退錢進薛，有「王、唐、瞿、薛」之目，此四家則蘇、常二府均分。然以上諸家究竟還是以古文為時文。昆山歸有光以其嚴謹的治學精神，追學問之根，求經義之本，戳透古文一層，直達經義之舊，其高古直追秦漢，其疏暢排宕又合于唐宋大家，遂屹然成為大宗。又有「王、唐、歸、胡(友信，浙江德清人)」四家之說。終明一代，「時文四大家」雖屢有所更，但總以蘇、常二府名家為主體。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旂、歸有光，成為有明一代科舉制藝的楷模。清乾隆元年(1736)所編定的《欽定四書文》，收明永樂以後時文名家一百五十一人，文章 486 篇。如以府為單位，則蘇州府入選三十一人 112 篇，居全國第一；常州府入選八人 35 篇，在江西撫州之下，居第三。如以縣為單位，則昆山入選七人 45 篇，在撫州臨川之下，居第二；武進三人 24 篇，居第五；嘉定二人 21 篇，居第六；吳縣三人 15 篇，居第八；太倉八人 11 篇，居第十；常熟四人 11 篇，居第十一；無錫四人 10 篇，居第十二，前十二位中蘇、常二府有七縣(州)。如以單人來算，歸有光入選 34 篇，居第二；唐順之 21 篇，居第四；黃淳耀 20 篇，居第五；王鏊 13 篇，居第七，前七位中蘇、常二府有四人。

²⁷ 王世貞《觚不觚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此亦足以說明蘇、常二府的時文水準之高。

對於吳中來講，科舉的發達就意味着作家隊伍的壯大。當然，二者之間並非是完全對等的關係，制藝能力強，不見得就文學水準高。但總體來講，吳人好古，重視學問的博大深厚，其學養一般而言是豐富全面的，而且他們並不死讀制藝之書，既中得狀元，考得進士，亦寫得詩文，填得詞曲，這是由吳文化的特質所決定的，因為吳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含融性很強的、具有創新活力的文化。

吳寬「為諸生，蔚有聞望，遍讀左氏、班、馬、唐、宋大家之文，欲盡棄制舉業，從事古學。部使者迫促，乃就鎖院試。」²⁸吳寬是吳中縉紳領袖，是吳中士人的榜樣，他的治學之道在吳中士人中頗有代表性。吳人大多不是一頭紮進舉業中鑽不出來，所以很多人在中進士、中舉人以前，就以詩文名世。王鏊是公認的有明科舉時文大家，他連捷魁元後，「文名一日傳天下，程文四出，士爭傳錄以為式。」但王鏊聽到後卻歎道：「是足為吾學耶？」他曾建議朝廷仿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材。身處吳中，他有深切體會，吳人之才，不是區區一個制科所能衡量的出的。正如吳寬所言：「區區科第何難耳！」²⁹這話恐怕只有吳人敢說。顧鼎臣為宜興杭淮作墓表，說杭淮中進士做官後，因「長於文學，短於吏事」，結果被當政勒令「回籍聽用。」很多人登科入仕後，為政之餘，往往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學創作中來，乃至將治邑、官衙當作了創作與交流的場所，這也是吳中士子的一個特色。這些實際上都在說明吳人科舉與文學並重的思想，與他地士人在科舉道路上越走越窄自有不同。

吳地尤其是蘇、常二府制舉的發達，不僅意味着作家隊伍的壯大，而且還意味着高素質作家隊伍的形成。尤其是成、弘以後，江蘇作家中的大家、名家，幾乎都出自蘇、常二府，而且大多都是從科舉走出來的。可以

²⁸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丙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75 頁。

²⁹ 吳寬《送胡彥超》，《家藏集》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說，吳中作家隊伍之所以繁盛，創作水準之所以高，之所以處於全國領先地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於它的文教科舉的發達。

四、文化家族： 吳中文苑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文化家族的大量湧現，是明代吳中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在吳中地區，由文化家族走出來的作家，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前後相繼，源源不斷。由於有家族的深厚文化積澱及良好傳承，故這些家族作家一般文化修養較高，文學創作成就也較高，經常成為當代作家隊伍的主力。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化世家、文化家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吳中文苑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以文化世家、文化家族為背景，可以為個人帶來各種利益，在科舉、仕宦、鄉望等方面占得先機，而為了延續和更好地發展，又必然促使家族內部建立起保障、約束的機制，使傳統得以繼承光大。何況在吳中，已經出現了文化世家、文化家族群，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之間必然出現競爭，有競爭就有壓力，所以，在壓力之下，吳人更加重視家族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傳承。文徵明為長洲名族沈周家族所寫的《保堂記》云：

詩書之澤，衣冠之望，非積之不可。而師資源委，實以興之。不幸而門第單弱，循習陋劣，庸庸惟其常。其或庶幾自拔而亢焉，則深培痛湔，銖銖寸寸，咸自吾一身出，厥亦艱哉！人惟其艱也，而又能是也，於是相與譽之。有弗良，亦置弗責，其素微無異也，使其有一線之承，則人得以比而疵之，以為而門戶若是，而父兄若是，聞見麗澤若是，而弗能是，是不肖者。從而曰：‘是某氏之子也’。



可不懼哉！夫門第之盛，可懼如此，乃不若彼無所恃者之易於為賢，豈此之所負固重哉！³⁰

沈氏家族是吳中十分典型的文化家族，其家族從沈周曾祖始發家，而真正響譽江南，則是從其伯父沈貞吉、父親沈恒吉開始的在文藝上的崛起，「二吉」的成名，緣于其父沈澄為其請了當時著名的「陳五經」陳繼。陳繼以貫通經學而被朝廷召以五經博士，又以善畫竹而聞名于時。由此亦見吳人頗重延攬名師以振其家學的傳統。到沈周，詩畫皆擅，更成為「吳門畫派」的領袖人物，其影響一直貫穿到清代。在當時，沈周就被稱為「布衣之傑，隆望當代」。家族文化發展到這樣一個高度，對於後代來講，確實難乎其繼，其壓力可想而知。為此，沈周之子沈維時，特於家族中建「保堂」，其重要的目的是：「君子于此有憂焉，蓋其侈滿成習，易為驕誕，勢之所至，有不終之漸。」³¹保堂就是保其家，是將家族文化精神、文化傳統以物化的形態，通過近於宗教儀式的崇拜與警示，以砥礪族中子孫，承其家風，延其瓣香。沈維時的這種行為，典型代表了吳中文化家族的心聲。

其實，以文徵明為代表的長洲文氏家族也是蘇州一個重要的文化家族。自文徵明曾祖文惠棄武習文始，九代人中有詩文著作傳世者多達二十五人，故清雍正間楊繩武為其族譜作序云：「吳中舊族以科第簪冕世其家者多有，而詩文筆翰流布海內，累世不絕則莫如文氏。」³²其第三代文徵明詩文書畫兼精，主盟吳中文藝達三十年之久，徵明二子文彭、文嘉延續鼎盛勢頭，以後家族成員或詩文書畫兼工，或專工一藝，風流奕葉不絕。第七代文震孟，天啟二年（1622）舉進士第一，仕宦最顯，官至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以名德氣節聞名于時。明亡後，文氏家族擅名者亦不乏人：震

³⁰ 文徵明《相城沈氏保堂記》，《甫田集》卷一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³¹ 文徵明《相城沈氏保堂記》，《甫田集》卷一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³² 楊繩武《文氏族譜續集序》，文含《文氏族譜續集》卷首，見上海圖書館藏《曲石叢書》。



孟之弟震亨能詩善書畫，著述頗豐，明亡後，憂憤發病死；第八代文秉不僅以氣節名，更以著史而稱，於明亡後隱居竺塢，奮力著明朝之史，以之終其身；文柁明亡後隱居寒山，大江以南稱文章節義士，工詩書，畫山水，一稟祖法。

明代吳中所以文化家族繁茂，綿延不絕，就是因為他們大都對家族發展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而且能夠上升到一個高度，即不以物質的累積作為稱雄一地的家族榮耀，而更看重於一種精神與物質相結合的家族積澱，從某種角度上講，富有文化特色的體現某種精神內涵的深層面的東西，更被吳人所看重。

中國古代所謂「詩書繼世」，被吳人演繹得最為透徹。明代蘇州地區，父課教、母督子、妻促夫，讀書求仕的場景隨處可見。一個家族中，最初博得功名者，往往成為後世子孫的榜樣，並標置為家族的精神領袖，這個家族就逐漸發展為一個文化世家，瞿景淳以制藝名高當世，其少子女說五歲而孤，長子女稷「以兄代父，以身為師，安人（女說母）又時詔以文懿（景淳）遺訓。」³³《明史》中記汝說，「構文成，輒跪薦父木主前」³⁴。這就是文化家族的巨大內在感召力。

常州府的家族好學之風亦絲毫不亞于蘇州府。無錫華氏、秦氏是當地的著姓望族。鵝湖為華姓聚居區，萬歷時顧冶見到的情景是：「湖之長亙數里，水清絕可釀釀者，色皎若寒玉……實鄉以東一沃壤也。其鱗次牙錯而居者，大抵歸華族，士挾詩書排金閨、登玉署，至踵接於途，鮮不觝觝稱豪矣。」³⁵無錫秦姓好以秦觀後人自居，據譜系載，秦觀卒於藤州，歸葬高郵，北宋政和間，其子秦湛為常州通判，遂家於常州，遷秦觀墓於璨山。

³³ 葉向高《瞿公偕配施恭人合葬墓誌銘》，《蒼霞餘草》卷一〇，《四庫禁毀書叢刊》第一二五冊影印明萬歷本。

³⁴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一六，中華書局1974年排印本第5697頁。

³⁵ 顧冶《被褐先生蕭蕭齋稿序》，華善述《被褐先生詩文稿》卷首，《四庫存目叢書》第一四二冊影印明萬歷本。



無錫秦旭家族就是明代秦觀後人中最著名的一個文化世家，家族專門為秦觀建有「淮海秦先生祠堂」，族人延師授業於此，「尊賢於先，而因以風其後人。」³⁶以紹繼秦觀的文學創作來砥礪族人，故族中後人文學風氣濃厚。秦旭有三子夔、旦、奭，皆有詩名，秦旭自己雖無功名，但也以吟詠為事，創碧山吟社，稱「碧山十老」。

五、明代吳中作家獨特的文化人格

明代文人以江南為多，主要集中于太湖周圍一帶。江南山水秀美，人口稠密，經濟發達，商業繁榮，教育普及，文化鼎盛。特別是中晚明以後，由於經濟，特別是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文人以藝謀生普遍，加之新的社會思潮的影響，促使文人的思想性格發生變化。當時吳中文人普遍追求一種將精神提升與物質享樂結合起來的人生道路。他們生活於凡庸中，卻不妨以高雅的生活情調調和世俗生活的凡庸；他們生活於物欲中，卻不妨以清雅自持的生活方式來消滅人的過高欲望，從而追求一種調和世俗與風雅的人生道路，使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而在這背後，則是一種普遍的市隱心態和鄉願哲學。明代的蘇州，已成為影響四方的中心源，王士性《廣志繹》卷二中說蘇人「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³⁷蘇州引領吳中，吳中引領江浙，江浙引領全國，這種新的文化人格更典型地體現于吳中文人中。

³⁶ 邵寶《淮海秦先生祠堂記》，《容春堂續集》卷一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³⁷ 王士性《廣志繹》卷二，中華書局 1981 年版第 14 頁。



(一) 市隱心態³⁸

江南市鎮發達，特別是明代中葉以後，由於商業的特殊發展，迅速帶動起大小城鎮的繁華。明人王琦《寓圃雜記》曾將明初的蘇州和成化後的蘇州作了一番比較，明初是：「吳中素號繁華，自張氏之據，天兵所臨，雖不被屠戮，人民遷徙，實三都、戎遠方者相繼。至營籍亦隸教坊，道里蕭然，生計鮮薄。」而成化以後則是：「閭簷輻輳，萬瓦甃鱗；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張蓋，壺觴疊盒，交馳於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遊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于綠波朱閣之間。絲竹謳舞，與市聲相雜。」³⁹明代為科舉士人和商人編寫的《士商要覽》一書中，列出全國水陸行程一百條，其中有六條以蘇州為起點。據今人龍登高統計，到嘉、萬時期，蘇州府市鎮由南宋至元時的 33 個，發展至 73 個；常州府由 25 個發展至 39

³⁸ 市隱，原指隱居於城市，或城市中的隱者。《晉書》卷八二《鄧粲傳》云：「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唐·皎然《五言酬崔侍御見贈》詩云：「市隱何妨道，禪棲不廢詩。」（《杼山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白居易《中隱》詩云：「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諠。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白氏長慶集》卷二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代中後期，以工商業為主的市鎮于吳中尤其發達，吳中文人多居於此。沈周《市隱》詩云：「莫言嘉遯獨終南，即此城中住亦甘。」（《石田詩選》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嚴迪昌更明確地界定明成化以來以蘇州為中心的隱逸行為為「市隱」。（《「市隱」心態與吳中明清文化世族》，《嚴迪昌自選論文集》，中國書店 2005 年版第 290—330 頁）但吳中文人更多的是把它處理為一種心態，一種更具彈性的生存之道，亦即持「市隱」之道，而不見得要有「市隱」之實。

³⁹ 王琦《寓圃雜記》卷五，中華書局 1984 年版第 42 頁。



個。在蘇、松、常、杭、嘉、湖六府中，蘇、常二府是發展最快的⁴⁰，形成了一個密集的市鎮網。吳中文人不像北方文人多數散居于鄉村，而是大多寓居於大小市鎮，但他們身形居於市鎮，心靈卻拔於流俗，標榜「市隱」。

所謂「市隱」，實際是對白居易倡導的「中隱」的靈活運用。「市隱」並非只是山人、處士的行為，也並非要刻意營造出一種與世俗所不同的生活氛圍，吳中文人的靈活就在於他們更多地把它處理為一種心態，一種更具彈性的生存之道。不管是科舉勝出的仕宦文人，還是科舉失意的林下之士，吳中文人大多注重明哲保身，相對來講，他們博識多能，聰慧乖巧，而性情溫和，遇事不過於偏執、亦不過於激進，重大節，喜交遊，既不遠於情，亦不陷於私，大多能于持正中又不失靈活性，尤其善於進行自我心態的調節與釋放，善於將生活調節得適意而又不乏情趣。

吳中科舉發達，出仕人員的比例自然要比其他地區高得多。遍地縉紳豪門，然而能相互提攜，相互警戒，培養了他們善於應對大起大落的官場風浪的能力，既能進亦能退，既能升亦能降。進時他們能充分利用現時條件，廣交遊，多聯絡，以鞏固自身地位；退時他們不涉足官場，不招搖身份，而且有意識地與山林野士唱酬，與世外緇流交往。尤其在複雜的官場中，他們大多既能保護自我，又不失去自我。成、弘時期的吳寬、王鏊，嘉、萬時期的顧鼎臣、申時行、王錫爵，就很具有典型性，他們恰是明代中、後期吳中縉紳的代表人物。

吳寬當政時期正是明朝最為穩定的成、弘時期，算得上是太平盛世。吳寬一生於政治上並無多大建樹。當被選入內閣時，群僚慶賀，他則蹙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哉？我何以堪此勞哉？」在內閣為劉健所忌，徘徊不前時，又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之，甚安之。」其雖身處官衙，而頗有山林逸興，《靜志居詩話》卷八謂其：「在都門辟東園，築玉延亭留客，園中草木，莫不有詩。吏部後園，亦為掃除，欄藥檻花，暇必酬和，極友

⁴⁰ 龍登高《江南市場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2 頁。



朋文字之樂。」⁴¹他有一首《雪後入朝》詩，在當時朝廷官員中廣為傳誦，有名句曰：「為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官居高位，須要時時提防失滑跌倒，正形象地道出了他謹小慎微的為官個性。故他能周旋于劉健、李東陽之間而保令名終生。所以《明史》本傳中說他「行履高潔，不為激矯，而自守以正。」王鏊評價他為「大雅君子」。這種「雅量」就是吳人為官所追求的理想境界。王鏊比吳寬顯得剛健有為，但他所面對的是明代歷史上最為荒唐的少年天子明武宗，又有劉瑾「八虎」亂政，比之于吳寬時期，腳下之「滑」更是防不勝防。但在誅「八虎」事件中，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被迫致仕，尚書韓文被逮入獄，而王鏊卻入了內閣。他在《我生》一詩中寫道：「委順齊寵辱，冥懷無醜好。得之亦不驚，失之曾不懊。」吳、王的這種為官哲學在吳中頗有市場，故吳人屈指先哲名賢，首推二人。

嘉、萬時期的朝中大權，有一段時期曾是吳人的天下，即申時行與王錫爵相繼任首輔大臣的時期。申時行在張居正乾綱獨斷時，「蘊藉不立崖異」，二人頗得相安。申時行城府深沉，而王錫爵躁急於色，二人內心並不相睦，但於官場，卻能做到珠聯璧合。申、王二人，一性柔，一性剛，卻都能得世宗信任，且在明代最為複雜的朝局中都能全身而退。

市隱心態的保持，使得吳人並不迷戀於官場。楊循吉三十一歲歸隱，肆力於藏書著述，優遊林泉，以吟詠為事近六十年；沈璟「乞歸」時年只三十七歲，專心於戲曲創作和戲曲理論的研究，終成為一代戲曲大家；唐順之中進士後，做官時間不到十年即退居陽羨山，埋頭讀書、研究學問近二十年，形成了他的重要的古文理論，晚年再起，卻又幹出了一番轟轟烈烈的抗倭業績，能處亦能出。

吳人重鄉情、重交遊，這並非完全出於鄉土觀念，而是他們從鄉情和交遊中得到了實際利益。「市隱」生活是一種帶有很強的現實理性色彩的浪漫人生，他們追求一種藝術化的人生道路，與文人名士的交往就是一個很

⁴¹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八，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9 頁。



重要的組成部分。如吳縣「袁氏六俊」之一的袁表刊刻《江南春集》，原只是沈周追和倪瓚的三首詩詞，袁表竟收集了再和沈周之作的詩人五十家而編為此集。五十人中，絕大部分是蘇州作家，大部分又是袁表同時代的作家，而且是名家，由此可見袁表交遊之廣。沈周一生未仕，惟有以詩文書畫著名於世，這麼多詩人共同追和沈周之作，則完全是因為沈周是這種藝術化人生的典型代表。

(二)「吳趣」生活

市隱心態引導下的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追求居住環境的清雅化、清賞清供品的古雅化、清玩內容與清玩活動的高雅化等，後來晚明華亭名士陳繼儒將當時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文人生活情趣與畫家的藝術趣味等概稱為「吳趣」。吳中充滿「吳趣」的典範家族是沈周、文徵明家族。錢謙益在《石田詩鈔序》中曾描述過沈周的生活：

其產則吳中物土風清嘉之地，其居則相城，有水有竹、菰蘆、蝦菜之鄉；其所事則宗臣元老，周文襄、王端毅之倫；其師友則偉望碩儒，東原、完庵、欽謨、原博、明古之屬；其風流弘長則文人名士，伯虎、昌國、徵明之徒。有三吳、西浙、新安佳山水，以供其遊覽；有圖書子史，充棟溢杼，以資其誦讀；有金石彝鼎、法書名畫，以博其見聞；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寫其神情；煙雲月露、鶯花魚鳥，攬結吞吐於毫素行墨之間，聲而為詩歌，繪而為圖畫⁴²。

這段描述涉及到文化氛圍、居住環境、交遊人物、遊賞地域、室內陳設，

⁴² 錢謙益《石田詩鈔序》，《牧齋初學集》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76—1077 頁。



以及主人的生活內涵等諸多方面，對沈周的高雅生活作了全面展示，其突出特徵是將生活的每一個環節都進行細化、雅化、藝術化。它是明代吳中文人的共同趣尚和普遍追求，只不過因經濟實力的不同而略有等差，但追求的內涵則大同小異。如吳寬所述吳江高士史鑑的生活情景是：

家居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如入顧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鑒賞。好著古衣冠，曳履揮塵，望之者以為列仙之儔也⁴³。

史鑑與尹寬、曹孚、凌震號為成、弘間「四大布衣」，這種古雅環境裏的優雅人生，頗為吳人所重，故史鑑以賢良被薦之於朝廷，以鄉賢被祭之於祠廟。

吳人這種生活藝術化的追求，特別注重於「處」和「遊」。「處」則特別注重居住環境和生活氛圍的營建，「遊」則特別注重交名士、遊名山。對居住環境的講究，給明代的吳中帶來了大批的園林建築，明代僅蘇州城內園林最多時就達 270 餘處，有「城裏半園亭」之說。何良俊對三吳建園之風論道：「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營治一園。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贏，尤以此相勝。大略三吳城中，園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⁴⁴吳人好遊，而「遊」又要講究遊地、遊具、遊伴。至於室內陳設，則講究古鼎彝器，書畫法帖，要古而雅。

明人程羽文曾將文人的這種精緻高雅的生活概括為「三清」——清供、清賞、清玩。於是，在晚明的江南一帶出現了一系列推崇「三清」的著述，主要有程羽文的《清閒供》，屠隆的《考槃餘事》、《山齋清供箋》，文震亨的《長物志》、《清齋位置》，高濂的《遵生八箋》，陳繼儒的《巖棲幽事》，

⁴³ 吳寬《隱士史明古墓表》，《家藏集》卷七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⁴⁴ 何良俊《西園雅會集序》，《明文海》卷三〇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王象晉的《清寤齋心賞編》等等。諸書一是言及居住環境的清雅化：「吾儕縱不能棲巖止谷，追綺園之蹤，而混跡塵市，要須門庭雅潔，室廬清靚。亭台具曠士之懷，齋閣有幽人之致。」⁴⁵二是言及清賞清供物品的古雅化，特別是與文人生活相關的琴棋書畫、花鳥蟲魚之類更是講究，如養花重於賞花：「弄花一歲，看花十日」；山水小景要達到「一峰則太華千尋，一勺則江湖萬里」⁴⁶；衣飾要「居城市有儒者之風，入山林有隱逸之象。」⁴⁷三是言及清玩內容與清玩活動的高雅化，要在清雅而充滿古趣的環境裏，「相對啜天池茗，吟本色古詩，大快人間障眼」⁴⁸。

清供、清賞、清玩的真正目的是為了顯示其真韻、真才、真情，也就是採天地古今之靈氣，保我性命、人生之真純。這種人生追求體現于文學創作中，就是使吳中文學始終以「情」見長。

(三) 「鄉願」哲學⁴⁹

鄉願哲學不是吳中人的專利，而是江南文人的一種較為普遍的人生哲

⁴⁵ 文震亨《長物志》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⁴⁶ 文震亨《長物志》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⁴⁷ 文震亨《長物志》卷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⁴⁸ 高濂《遵生八箋》卷一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⁴⁹ 鄉願，古籍亦寫為「鄉原」，最早見於《論語》，《論語·陽貨》載孔子語曰：「鄉願，德之賊也。」（《論語集解義疏》卷九）《孟子·盡心下》釋曰：「闖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七）概言之，孔、孟所言之「鄉原」，指貌似忠厚、實與惡俗同流合汙之人。進而可引申為，鄉願即隨波逐流、趨炎媚俗者。對晚明士人來講，是一種「狂禪」時風下的極度世俗化的人生觀，將「大俗」標之以「大雅」出之，亦多少有些矯飾成份。



學，但吳人卻把它演繹得最好。上面所言的追求「吳趣」生活，更明顯地體現於明代中、後期的吳中，所追求的是一種高雅的生活模式，儘管這種高雅在「市隱」心態下已摻入了很濃的世俗成分，實際上是不脫離俗世享受的文人精神烏托邦的映現。而鄉願哲學則是使生活向着極度世俗化的方面發展，甚至以病態為美，追求的是所謂大俗中的大雅。鄉願哲學觀多體現于嘉、萬以後到明末這一時期。

當今學者往往過分誇大明季文人的病態審美觀，把它上升到人的思想解放、個性自由的高度，其實並不完全符合實際。程羽文在《清閒供》中曾概括出文人「六病」——癖、狂、懶、癡、拙、傲，但這種「病」人，不管在吳中，還是在其他地方，只是個別現象，並不是一種普遍表現，不能上升到整個文人群體的高度，更不能把它看成是一種社會思潮的體現。而少數文人的這些「病」雖然帶有一定魏晉名士的影子，不過有本質的不同：魏晉名士是不以為病，認為是人性的一種率真顯現，本質上是鄙視世俗的；而明人是以之為病，是以世俗作為參照，帶有更強的矯飾意識，本質上是融入世俗的。魏晉士人是在政治極為黑暗、極為恐怖的情況下，懷着對現實政治的憎恨而展示的，明代士人不具備這種充分的社會條件，是先以充分享受世俗生活作為前提的。魏晉士人是一種棄世的無奈，明代士人則是一種入世的圓滑。魏晉士人中的這種怪癖是形成了一個階層，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明代士人中的這種怪癖只是存在於少數人之中，且帶有一種明顯的功利色彩，多如袁宏道所言，之所以有「殊癖」，是為了贏得「名士」之令譽。張大復在《病》中也說得很直接：「病」是為了使「形」「駭於俗」，使「文」「奇」於世⁵⁰。說穿了，這是一種矯飾，其實際生活並不見得如此。

對於大多數吳中文人來講，這種鄉願哲學主要表現為兩點：一是由內在的精神上的高雅追求，更明顯地轉向了外在的感官上的享受；二是文化

⁵⁰ 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商業明顯地浮出了水面，由追求生活藝術化，更多地轉向了藝術生活化。

尤其是體現在迅速壯大的處士、山人人群中，不再是早期沈周、文徵明、史鑑、朱存理那樣的「高士」形象了，更常見的是雅、俗相融，清、濁互滲，遊、處不悖的世俗角色。俞允文稱：「吾不徇（徇）人，亦不避人；吾不厭世，亦不侮世；吾不以名就名，亦不以匿名釣名，如是而已。」⁵¹所言實際透露出當時山人依人徇人、借名揚名現象的普遍存在。嘉、萬時期吳中山人的最著名代表是王穉登，他早年依于內閣大學士袁煒門下，為人頗重義氣。但行為放誕，在《廣長庵主生壙志》中說自己「少尤好肉，嬖童季女不去左右。」他評價自己的一生說：「上不能為寒蟬之潔，下不厲為壤蟲之汙，蓋行己在清濁之間而已。」⁵²「在清濁之間」、「依人而不徇人」正是當時吳中山人品格的普遍表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文人群體。

明代吳中商業異常繁榮，尤其中期以後，在商業觀念衝擊下，文人也逐漸以其文化經營步入商業領域。但在成、弘時期，還不是一種很公開很普遍的行為，像沈周、文徵明等都曾恥於賣字賣畫，至少他們本人不介入這種經營活動，只有像祝允明、唐寅一類的放誕人物才會無所避諱。但到萬歷時，文人經營文化產業，則非常普遍，並以之作為謀生的重要手段。從賣詩文字畫，到從事編輯出版、經營戲曲演藝活動，都有文人的身影。張鳳翼就是一個較早經營出版活動的文人，他編刻《文選纂注》，還公開張貼賣文賣字廣告：

張孝廉伯起，文學品格獨邁時流，而恥以詩文字翰結交貴人。乃榜其門曰：「本宅缺少紙筆，凡有以扇求楷書滿面者，銀一錢；行書八

⁵¹ 王世貞《俞仲蔚先生集序》，《弇州山人續稿》卷四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⁵² 王穉登《廣長庵主生壙志》，《王百穀集》十九種，《四庫禁毀書叢刊》第一七五冊影印明刻本。



句者，三分；特撰壽詩壽文，每軸各若干。」人爭求之。自庚辰(萬歷八年)至今，三十年不改⁵³。

作為晚明著述宏富的吳中著名作家馮夢龍，包括深受其影響的另一位白話短篇小說巨匠烏程(浙江湖州)凌濛初的創作活動，都直接與商業謀利有關，研究已多，無須贅述。據方志遠《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一書統計，明代蘇、常二府是版刻業最為發達的地區，所刊刻的「市民文學」就有 641 種，2938 卷，位居第一。其中的吳縣、長洲、常熟三縣就占了 618 部，2803 卷⁵⁴。從時間上來講，絕大部分刻於嘉靖以後。從這方面也能看出明代中後期吳中文化與商業的關係。

六、餘論： 對江蘇明代作家文學史地位的認識

江蘇明代作家既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時又有數量和藝術水準上的優勢，遂使其在有明一代一直處於全國最為突出的地位。清人所編《明史·文苑傳》所述明代文學，雖然僅以詩文論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對這個問題做了比較實際的描述與評價，茲據以略談我們對江蘇明代作家文學史地位的認識。《明史》「文苑傳(序)」云⁵⁵：

明初，文學之士承元季虞、柳、黃、吳之後，師友講貫，學有本原。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高、楊、張、徐、劉基、袁凱以詩著。其他勝代遺逸，風流標映，不可指數，蓋蔚然稱盛已。永、宣以還，作者遞興，皆沖融演迤，不事鉤棘，而氣體漸弱。

⁵³ 沈瓚《近事叢殘》，北京廣業書社，1928 年版。

⁵⁴ 方志遠《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中華書局，2004 年版。

⁵⁵ 張廷玉等《明史》卷一七三，中華書局 1974 年排印本第 7307—7308 頁。



高、揚、張、徐「四傑」揚新幟於新朝開基之時，一掃元季纖弱之習，于明初詩壇厥功甚偉，其地位自無可代。尤以高啟為隆然大家，三百年詩人無出其右者。至於「其他勝代遺逸」亦主要集中于吳中，這就是昆山顧瑛的玉山詩社和蘇州高啟的北郭詩社諸人。

《文苑傳》又云：

弘、正之間，李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而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於斯一變。

李東陽的「茶陵派」主要作家，江蘇一為無錫邵寶，有「真詩惟在邵二泉」之譽；二為泰州儲懋，出「茶陵」入「七子」，頗見氣局骨力；三為「婁東三鳳」之一的太倉人張泰，故錢謙益有云：「弘治間藝苑，則以李懷麓、張滄洲（張泰）為赤幟。」⁵⁶「茶陵」週邊，尚有吳寬、楊一清諸家，才力亦可相抵。「前七子」之先，有「景泰十才子」，「十才子」之首為吳人劉溥，餘亦大多為吳人。「前七子」中的徐禎卿，雖乏李、何領袖流派之地位，然詩歌創作成就最高，故王世懋云：「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徐禎卿、高叔嗣)必無絕響。」⁵⁷

《文苑傳》又云：

迨嘉靖時，王慎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詩仿初唐。李攀龍、王世貞輩，文主秦、漢，詩規盛唐。王、李之持論，大率與夢陽、景明相倡和也。歸有光頗後出，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鐘惺之屬，亦各爭鳴一時，於

⁵⁶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丙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48 頁。

⁵⁷ 王世懋《藝圃擷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

所謂「唐宋派」代表人物三人江蘇有其二：唐順之、歸有光。歸有光文「繼韓歐陽」，稱有明古文第一家。至於「後七子」復古派，王世貞才力「十倍于麟」，其主盟文壇之聲望，其詩文創作之繁富，亦為有明第一人。無獨有偶，宗臣之於王、李，一如徐禎卿之於李、何，宗子相亦可稱為「後七子」群體中之最著者。「嘉定四先生」之名氣，雖不及「三袁」，卻出於性靈而高於性靈，縱不能與三袁比，與鐘、譚相較，勝之有餘。

《文苑傳》再云：

至啟、禎時，錢謙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擷東漢之芳華，又一變矣。

艾南英不及錢謙益名高才博。張溥創作成就遜於子龍，然領導復社之名氣遠勝於子龍，二人一為明末散文國手，一為明末詩歌大家，大致匹敵。

以上主要就詩文論之，其他文體，如明傳奇劇壇，推第一人自是江西湯顯祖，然能與湯之「臨川派」相抗者，惟沈璟之「吳江派」。論創作，沈不抵湯，然論戲曲音樂之貢獻，湯不抵沈。吳中戲曲作家如春筍勃發，形成群體，唯越中可與之比肩，沈璟領其風騷，而湯氏卻無此際遇。成熟時期的三大傳奇——《浣紗記》、《鳴鳳記》、《寶劍記》，江蘇亦有其二，且昆腔改革在吳中，《浣紗》首以昆腔新聲搬演於甌甌，其地位自不可泯。散曲一體，輝煌已去，入明後，可稱之為大家名家者，不過五、七輩，而江蘇有其三：北曲之冠屬之王磐，南曲樂王歸於陳鐸，而令人絕倒者，又非金鑾莫屬。白話小說亦為明代重要文學樣式，種種事實證明，江南一帶實為明代白話小說發展之主要基地。《三國》、《水滸》、《西遊》均為「歷代累積型」作品，最後成於誰手，迄今並無定讞，然連帶後出之《金瓶梅詞話》，「四大奇書」至少有兩部可以確定首刻于南京、蘇州，然後流播天下。至



於長洲馮夢龍更以其所編著之「三言」，奠定了在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領域中的泰山北斗地位，自不待言。

根據我們的初步考察，有明一代可稱為「作家」者有八千人以上，占籍於今江、浙二省者加起來均而半之。就江、浙二省而言，浙人總數略略占優，然自明初兩地各有擅場、軒輊難分，宣、弘以下，浙已漸後於蘇。其「卓卓表見者」，浙不占人氣；其設壇立盟者，浙不占地利；其文高體備者，浙不占強勢。故總體而論，江蘇勝於浙江，而勝於浙江，自可雄視全國，是為江蘇明代作家之地位。然此等非本文所能詳述，文促紙短，僅擇其犖犖大者概而言之，若至委曲變化，自不可勝道。

